

## 绪 言

本书为《河北通史》清朝下卷，叙述和研究的是清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1840—1911年）共72年河北地方的历史。在这个时期，河北同全国各地一样，逐步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

直隶地处京畿，数百年来为中国封建统治的中心，也是各次农民起义军势在必得的争夺目标。因此，在这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十分尖锐。清代后期，农民起义军曾多次在直隶大地上驰骋，使清王朝封建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即组织力量北伐。北伐军两万多人征战数千里，于八月底进入直隶，北上连陷沙河、任县、隆平（今隆尧）、柏乡、赵州、栾城、藁城、深州等州县，前锋直指京师。同治七年（1868年）初，西捻军由豫入直，其前哨部队推进到距京师仅十余里的卢沟桥。清室一日数惊，急传各省起兵“勤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夏，京师周围各州县义和团民大批涌入北京城，迫使西太后在“剿抚两难”的情况下，不得不对义和团的态度作出最后的抉择。

直隶东临渤海，从天津登岸至京师，徒步也不过两三天的工夫。侵略者利用清室极端害怕洋人的心理，多次扬言兴兵北

上，迫使清政府对他们让出更多的权益。道光二十年，英国侵略军在阿律的率领下，兵临天津海口。咸丰十年六月，英法联军从北塘登陆，直逼京师，咸丰帝被迫“秋弥木兰”，东北走热河。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八国联军从天津溯运河两岸北上，长驱直入，二十日陷北京。二十一日，清朝最高统治者再次“蒙尘”，西南走太原、西安。侵略军的足迹几乎遍及直隶全境。

为了加强抵御外来侵略的军事实力，同时也为了更有效地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近代以后，清廷加紧在直隶全境备战。道光二十一年，直隶总督奏准在大沽、北塘等军事要地修筑炮台，添铸大炮。咸丰八年恢复天津水师。光绪元年开始筹建北洋水师。光绪二十年着手在直隶小站试练新军。20世纪初，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充分利用清廷急于成军的心理，在直隶境内加速新军的编练。从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练就北洋常备军六镇。这支新军，装备精良，饷械充足，训练有素。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看到清王朝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唆使其部下上书胁迫清帝退位，并以这支新军为资本，拉开架势，对南方的革命势力一打一拉，把直隶变成其反对革命的主要根据地。

清代末年，直隶成为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势力、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矛盾斗争的重要舞台。在直隶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呈现出各个阶级、各种势力之间你争我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局面。

农民起义军进军京师的目的，是要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帝国主义侵略军进窥京师的主要目的，则在于迫使清廷屈服，使之成为其对中国人民进行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的驯服工具。从自身的立场出发，清封建统治者认为，外来侵略只不过是“肘

腋之忧”、“肢体之患”；“发捻交乘”才是“心腹之害”。按照两害相衡取其轻的原则，他们加紧了中外合作、“借师助剿”、共同扼杀太平天国革命的罪恶勾当。同治三年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的败灭，在统治阶级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一部分官僚地主，即洋务派不得不承认西洋“船坚炮利”的事实，决心在国内修船造炮，“师夷长技以制夷”。同治元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枪炮局，仿制洋枪洋炮。同治四年，李鸿章、曾国藩在上海筹建江南制造局。第二年，恭亲王奕訢深恐江南出现的新式军火工业会导致地方势力的过份膨胀（事实上太平天国失败后，地方势力已有尾大不掉之势），奏请在京城附近的天津设局，专制外洋各种军火机器。这样，在中国北方便出现了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天津机器制造局。同治九年，李鸿章继曾国藩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按照其既定路线，在直隶大力开展洋务运动，建立北洋海军，创办军事学堂，开矿山，修铁路，架电线，办工厂，使直隶一时成为中国北方的洋务中心。

开始时，洋务派在国内兴办的各类军事工业，无论是原材料的供应还是技术装备等都严重依赖于外国。为了解决原材料的不足和资金的短缺，他们又在国内兴办了一些民用工业，目的在于以民用工业的“求富”来补剂军用工业的“求强”。于是，一些与民用直接有关的工厂先后在直隶诞生，其中较著名的有创办于光绪四年的开平煤矿。在这个期间，中国的第一个近代煤矿——唐山煤矿，第一条标准轨距的铁路——唐胥铁路，第一条跨省的电报线——津沪电线，先后在直隶建立。随着军用、民用工业的发展，急需各种军事、技术人才。于是，直隶的天津、唐山、山海关一带相继建起一批军事学堂或与军事有关的

其他学堂。如北洋大学的前身中西学堂，便是在这个期间（1895年）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二十世纪初，袁世凯率先在直隶推行“新政”：变革军制、兴办巡警、考核吏治、创建实业，大力发展近代教育事业，使保定骤然成为直隶，甚至全国的军事教育中心。其他如天津、唐山等地也有各类学堂的建立。至辛亥革命前，直隶的办学规模和在校人数在全国各省区中名列前茅，其学务资产为全国之冠。

洋务运动是清末封建地主阶级的一次自救运动，其目的在于增强实力，维护行将就木的封建统治。尽管在兴办的各种工业中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但是洋务运动中的一些洋务设施，包括后来袁世凯在“新政”中所实行的某些改革措施，客观上推动了直隶民族工业的发展，为直隶的近代工业培植了技术骨干力量，改变了直隶的社会结构，对直隶的社会进步发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帝国主义列强在对中国进行军事入侵的同时，也加紧了文化侵略。基督教的传入无疑是这种文化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首先是天主教）在直隶有较深厚的基础。据统计，至义和团运动前夕，天主教在直隶（包括北京、天津）已有教徒 203189 人，教堂 3650 座。加入天主教的教徒并非完全是虔诚的信教者，其中有些人完全是为了在教会的庇护下，欺压百姓，予取予求。至于各地的传教士，也有不少人恃帝国主义势力，插手民间诉讼，干涉中国内政。此外，由于基督教精神与直隶民间固有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相对立，加剧了民、教之间的冲突，以至近代以来“教案”频起。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是这个时期直隶人民反对教会势力的集中表现。光绪十七年热河一带的金丹道教和在理教的起义，把这一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发生在光绪二十六年的义和团运动，则把直隶人民反对

教会势力的斗争推向新的高潮。

义和团运动首先在直、东边境兴起，其斗争中心则在京、津两地和直隶全境。这显然与当时直隶所处的特殊环境有关。第一，在海上，天津自通商以后，百货皆用外国轮船装载，本地富户海船失业，穷民游手众多。在陆地，自海运开通以来，运河漕运完全停止，造成了一大批与漕运有关的劳动者的失业。第二，因开矿山、修铁路、办工厂，所到之处，官府强行占人田业，毁人庐墓，沿途骚扰，以致人民苦累无穷，其中尤以“毁人庐墓”一节最为人们所痛恨。第三，从一种宗教偏见出发，人民群众往往把历年的天灾人祸与基督教的传播直接联系起来。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直隶、山东一带水旱灾害频仍，他们认为造成这些灾害的原因“全是教堂止住天”，只有消灭了洋鬼子，才能迎来“风调雨顺”的丰收年。于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人们终于揭竿而起，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各地的教会势力。

19世纪末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出现，但由于这个阶级的软弱性，不可能成为义和团运动的领导者。义和团运动实质上仍然是一次单纯的农民战争。不过与中世纪各次的农民起义相比较，又有许多自己的特点。第一，义和团运动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所面临的敌人不仅有封建地主阶级，还有手持近代武器的帝国主义势力。在相对强大的敌人面前，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冥冥中诸神的力量，以“刀枪不入”等神话来与敌人相抗衡。第二，义和团在对敌斗争中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和为大家所公认的领袖。第三，直隶人民所遭到的各种侵害都直接间接与外来侵略有关，人们既不可能分清帝国主义侵略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区别，只能从一种感性认识出发，把凡与“洋”字有关的事物都“皆所深忌”，而这正是义和团笼统

排外在认识上的根源。

义和团运动是直隶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一次反帝爱国运动，在清王朝的利用和出卖下，很快被反动派所扑灭。义和团运动给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前所未有的打击，同时也使直隶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于直隶来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天津被迫开埠，加速了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就是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下，封建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一整套旧体制遭到不断的破坏，逐步走向崩溃；而具有若干资本主义性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一整套新体制逐步出现和确立。

天津是直隶总督的驻地。《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天津划分租界，设立领事馆，建立教堂，控制海关，开设洋行、银行，开办学校、医院，创立报纸，设立监狱、法庭等，使天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与此同时，以天津为据点，各资本主义列强把其殖民主义触角伸向内地。他们利用与中国订立的各项不平等条约所享有的关税特权，疯狂地对直隶人民进行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破坏了直隶农村的自然经济，加速了城乡手工业者的破产。光绪二十一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合法化，外国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形成了一体化的经济侵略垄断组织。他们在直隶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牢牢控制了直隶的经济命脉。据统计，从光绪二十二年至 1913 年，外国资本在直隶的投资总额约为直隶民族工业创办资本的 1.6 倍，约占资本主义各国在华投资的三分之一。

光绪二十六年，英帝国主义者乘义和团运动之机，以欺骗

手段窃夺了开平煤矿和秦皇岛港。1912年初，英国资本家经过多方威胁利诱，合并了滦州煤矿。合并后的开滦煤矿，其实权完全掌握在英国资本集团的手中。他们凭借其特权，垄断中国煤炭市场，操纵煤价，其年利润总额仅合并后的第二年就达473万银元。开滦煤矿及其所属各矿厂，包括外国人所居住的西山一带，成为侵略者实际上的殖民地。

义和团运动期间，英、俄、德、法、美、日、意等国强占了秦皇岛、山海关，长期拒不撤军。为了取得各国对英国独占秦皇岛港的承认，列强之间在经过多方争夺之后，终于达成协议，由英国取得秦皇岛沿海港湾地区的统治权，使该港成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在直隶的一个独立王国。光绪二十七年，作为天津海关的一部分，秦皇岛港海关分关归外国人管理。

尽管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强化，但它终究无法阻止直隶民族经济的发展。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直隶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缓慢地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至1913年，直隶（包括北京、天津）拥有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新式企业62家（不包括开办资本在一万元以下，或虽在一万元以上，但全部采用手工业生产的企业）。从数量上说，商办企业是直隶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的两倍，约占全国同期商办企业总数的9.3%。从开办资本上说，商办企业相当于直隶同期其他性质企业开办资本的1.47倍，是全国同期商办企业开办资本的12.6%。尽管这时直隶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力量还很薄弱，但它毕竟已在直隶的大地上出现。

## 第一章 英法等国的入侵与太平军北伐

### 第一节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和直隶的备战活动

#### 一、鸦片烟毒在直隶广为流传

烟毒的泛滥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很早就来到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从事贸易活动。至 18 世纪中叶，英国的对华贸易额已跃居世界首位。但是由于清政府的锁国政策和中国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抵制，英国的工业品未能在我国广为行销，其对华贸易额一直处于入超的不利地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决定从印度向中国输入鸦片，借此补偿其贸易逆差，获取暴利。

清代，天津为华北重要港口，又靠近盛行吸食鸦片的贵族官僚集中地北京，因此，从道光十二年（1832 年）起，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便开始直接向天津走私鸦片。鸦片多数是通过福建、广东商船从英国鸦片贩子转运而来。据道光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江西道监察御史狄昕《请飭拿天津洋船夹带鸦片由》奏折称，每年到达天津的闽、广商船有一百数十只，其中许多都

夹带鸦片。这些鸦片，一部分在天津洋货街的货铺和针市街的洋货局中销出，大部分经“窑口”（包买商）转贩给山、陕等处商人或包运至北京。据《清宣宗实录》记载，19世纪30年代，“两广、福建商民，雇驾洋船，转贩杂货，夹带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天津。……山、陕等处商贾，来津销货，即转贩烟土回籍”。当时直隶、山西、陕西等省民人所吸食鸦片，几乎全部由天津偷运入境。

鸦片走私进入天津，全部由闽、广豪商巨贾所包办。他们往往通过贿赂关隘弁兵、勾结沿海匪徒等手段，把鸦片烟箱节节保护递送。由于得到各地府州县的包庇和京城中官僚贵族的袒护，以致鸦片烟毒在直隶广为流传。以北京为中心，在直隶的吸食鸦片者，上自满洲亲王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不特军民人等共相吸食，即现任职官，并多染此恶习”<sup>①</sup>。如直隶房山县知县宋玉嘉、署密云县知县冉学诗、宝坻县典史王心培，都因吸食鸦片而遭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

直隶的禁烟措施 鸦片烟毒的泛滥，严重损害了人民的健康，而且造成白银的大量外流。道光十七年，据御史朱成烈奏称，“广东海口，每岁出银至三千余万，福建、浙江、江苏各海口，出银不下千万，天津海口，出银亦二千余万”<sup>②</sup>，而实际上白银的外流还不止此数。由于白银的大量外流，造成银根短缺，银贵钱贱，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这一切不能不引起封建统治者的极度不安，屡次下令禁止鸦片进口，并责成各地议定查禁鸦片章程。道光十七年和十八年，山海关、朝阳分别拿获夹带烟土案，盛京将军宝兴奉旨办理，并妥议章程，对包庇烟贩的

<sup>①</sup> 《清宣宗实录》卷 316。

<sup>②</sup> 《清宣宗实录》卷 298。

胥役及失察官员加等治罪。但无论禁烟法令如何严厉，章程如何周密，鸦片烟贩通过各种渠道，以贿赂、收买等手段，使鸦片走私不但未见减少，反而愈演愈烈。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主张严刑峻法，对吸食者限期禁绝，否则处以死刑。但这种严厉的主张遭到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等官员的反对。琦善认为，制定严刑峻法“与明刑弼教之原，不无牴牾”，主张不必对吸食者课以严法，而应采取宽容的政策。他着重指出，“立法贵于平情，而惩恶在于诛首”，重治吸食者只是“遏流”不能“清源”。因此，“扼要之策，似当严禁囤贩，重治惩办，以绝根株”<sup>①</sup>。其办法是，加强沿海的稽察，断绝鸦片的来源，这样吸食者必然自戒，贩烟者只好另寻别业。至于地方官员，可采取奖励的办法，按其获犯多寡以及在禁烟中出力多少，量以升阶、议叙。道光十八年八月，琦善在直隶先后拿获烟土 1.6 万余两，人犯 11 名。同年九月，琦善从保定赴天津，九日在大沽口外的一艘叫做“金广兴”的洋船上，起获烟土 82 袋，计重 13.15 万余两，并起获烟枪 107 根。因拿获严紧，这一年到天津的洋船，截至八月二十八日，已有 120 只不能起卸上岸，仍将原物载回，另谋出路。为了贯彻其“拔本清源”的主张，九月，琦善偕同长芦盐政钟灵制订了《稽查天津海口章程》七条，规定“一，闽广出洋商船由原籍厅州县给与票照来津，进口向文武衙门呈验申报，以备稽察；一，商船往返外洋所带军械，进口后呈交大沽营守备营暂存，俟返棹领回，以重海防；一，商船进口节节稽察，以防偷漏；一，商船应令停泊空处，不准挨近民房、铺户，以杜勾串；一，查验货物逐名签探，以防夹带；一，海河两岸居民、铺户暨天津府城外行栈、店

铺应立牌保，以严纠察；一，上海沙船、天津本处商船应一体搜查，以杜接运<sup>①</sup>。这个章程，对直隶的鸦片走私无疑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应该说，琦善的禁烟主张是积极的，并做了一些工作，只是由于清廷的腐败，鸦片走私不可能在直隶绝迹，鸦片烟贩往往与官府吏役串通一气，走私贩私，以致鸦片烟毒在全国各地照旧流传，从未根绝。

## 二、英军侵扰渤海湾

不管朝廷内部在禁烟问题上意见如何分歧，广大人民群众吁请查禁鸦片的呼声越来越高。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道光十八年十一月，道光皇帝决定委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在道光皇帝的支持下，林则徐在广东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为了维护殖民主义者的利益，英国内阁决定发动对华侵略战争。

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英国侵略军齐集广东海面，封锁珠江口。六月二日，派出主力，包括战船 20 只 士兵 4000 名，扬帆北上。六月七日陷浙江定海。三十日，英军统帅懿律率军舰 5 艘、汽船及运输舰各 3 艘，由定海启锚，于七月十二日到天津白河口。十四日向清政府投文。同时下令封锁海口、扣留粮船、测量水位，为对华的军事行动作进一步的准备。

战争发生前，林则徐曾多次上书，请飭沿海各将军、督抚筹备战守之策，道光皇帝也曾多次诏令直隶加强防御，以备英舰北上寻衅。但琦善屡以水师不必设，炮台不必添等来搪塞，以致直隶沿海各海口的战备长期废弛，防守空虚。鸦片战争开始时，天津存兵只有 800 余名，能作战者 600 余名，其余葛沽、大

<sup>①</sup>《清史列传》卷 40《琦善》。

沽也只是一二百名士兵。定海陷落后，六月二十八日，道光皇帝再次谕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提镇等加强防务，严查奸宄。在这种情况下，琦善才不得不檄令滨海地方文武官员将海上渔船逐一编号，加强稽查，以断绝渔户与英船的来往。除天津、宁河二处外，令各海口凡可堵塞者均签订暗桩，仅留容一船行走的航道。七月九日，琦善从保定赶赴天津，为解决兵力的不足，令先行从河间、正定等处调 2000 名士兵驻扎海口。在宁河北塘口，派遣张家口副将石生玉和务关路参将郝永泰、东路同知何耿绳会办军务。永平府（治所今卢龙县）及丰润县等海口，委清河道朱任林、开州协副将向荣、山永协副将兴泰筹防。同时从宣化调来大炮，运送天津存备。山海关本无存炮，为欺骗敌人，琦善饬委员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前明废炮数尊，蒸洗备用。上述这些措施只能是权宜之计，不足以对付敌人的攻击。

起初，七月六日，道光皇帝在给琦善的上谕中，曾要他对英国侵略者采取强硬的态度：“此处不准通夷，断不能据情代奏，以杜其覬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sup>①</sup>但七月十二日，当英船兵临海口，道光皇帝被吓得惊惶失措，立即谕知琦善：“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sup>②</sup>本来琦善对英军就心存疑惧，从维护封建统治者的既得利益出发，他认为“天津切近京畿，凡盐漕铜船皆由此来，最为咽喉重地。设使边衅一开，该夷狡焉思逞，频相滋扰，致我劳师糜饷，所关匪细”<sup>③</sup>。因此，他顺水推舟，于七月十六日奏报中声称“该夷尚无桀骜情形”。十八日，琦善委千总白含章到白河口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12。

同上。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13。

接受英国照会。该照会诬蔑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活动是“扰害”英国人的“威仪”并提出赔偿烟价、割让岛屿等无理要求，限令清政府于十天内答复。二十七日，琦善以英国殖民主义者意图贸易、恐货物发霉、难以回国；似有愧悔之心”上报。于是道光皇帝据此谕知军机大臣等，要求对英国侵略者“借用羁縻之法”。八月四日，琦善邀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等十余人会议于海滩帐篷，向侵略者承认英国人是受虐待了，答应惩办主战派林则徐等，对英方所提的各项无理要求，同意在英舰回南方后谈判解决。而这时英国兵力有限，战线延长，不利久战，且冬令将届，湾中不能进行有充分而有适当效果的攻势。<sup>①</sup>遂同意琦善的要求，于八月十九日将其舰船驶离白河口，折回南方。

在白河口交涉期间，英舰曾乘间在渤海海面任意游弋，并曾分派兵船到奉天复州湾之长兴岛、山东登州之砣矶岛等处侵扰。七月二十三日和二十七日，英军趁连日大雨，地面漫水深一二尺之机，两次浮驶舢板，持械上岸，到距黑洋河河口海面 20 余里的黑沿子村骚扰，“其村民中有畏怯躲避者，该夷即将其牲畜自行攫取”<sup>②</sup>，并在村中散发英国照会，扩大政治影响。

八月一日，到各处侵扰的英舰返回白河口。九日，英舰又一次开往宁河、丰润、永平府属等地面侦察，并深入中国海防要地山海关，“带备工于绘图之人，随处绘图”，探得该处“止有弓箭，并未见有炮位”<sup>③</sup>。

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丛刊本（五）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第 93 页。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1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14。

### 三、直隶的备战活动

英舰离开渤海湾后，八月二十一日，道光皇帝正式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东与英国代表谈判，直隶总督一缺由陕西总督讷尔经额署理，第二年实授。

**第一次备战活动** 直隶地当京畿，天津为京师门户，清政府对直隶的布防一向较为重视。讷尔经额到任后，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由保定赶赴天津视察海口。他认为“天津大沽海口，南北两岸为郡城门户，实为神京唇齿”<sup>①</sup>，奏准在大沽、北塘等海防要地修筑炮台、添铸大炮。天津镇标兵额原编 1 000 余名，不敷遣用，清廷命把直隶简僻地方的营额裁撤 500 名，划给津镇募补。同时，讷尔经额调省标兵 500 名、正定镇 300 名、河间协和务关路各 200 名到防。至十二月底，天津诸海口驻军增至 2 500 名。在北塘、山海关一线，讷尔经额也作了部署。道光二十一年一月五日，清廷下令对英宣战。从十一日至十三日，秦皇岛外先后发现有数艘英舰在海面游弋，山海关副都统扎拉芬泰迅即札调喜峰口、冷口营鸟枪兵 100 名赴关。十四日，清廷命讷尔经额驻天津督办海防，命署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哈琅阿驰往山海关协防。不久，讷尔经额又奉旨调提标兵 800 名援关。至十八日，清政府在直隶海疆共集结兵力约 5 000 名。此外，还有千余名正在援关途中。

**第二次备战活动** 《广州条约》签订后，道光皇帝以战事平息，于六月十一日指示沿海各省酌情撤军归营。十七日，批准直隶海防保留调兵 3 300 名，其余撤回原来汛地。但不久战事又起，为确保京师安全，清廷被迫开始在直隶进行第二次大规

<sup>①</sup>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16。

模的备战活动。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九日，厦门失守。二十日，英军离开厦门北进。八月一日，道光皇帝命陕西提督胡超挑兵 2 000 名，分批开赴天津，是为调动外省兵力入直隶的开始。在此之前，讷尔经额在海防留守部队的基础上，抽调督标正定、天津二镇兵各 1 000 名，提标 1 300 名增防。这样直隶沿海兵力猛增至 7 600 名。三日，讷尔经额亲赴大沽，添调大名、宣化二镇兵各 800 名，三屯协 400 名，令半个月內到防。三十日，讷尔经额奏请添募营兵 6 000 名，清廷著军机大臣等会同兵部议奏。九月十九日，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于直隶各标营中拨十分之一，得兵 3 200 名，其余 2 800 名，准由直隶总督先行招募。

在山海关方面，八旗副都统富勒敦泰也度地调兵，先期布防。时总兵力为 1 200 名（包括喜峰口、冷口 100 余名）。八月十一日，清廷调吉林兵 500 名入关，500 名驻锦州，还有黑龙江兵 1 000 名集结盛京待命。在吉林兵入关之前，先拨提标、宣化镇标兵各 300 名和天津之三屯协 400 名援关。不久，定海失守，八月二十七日，清廷寄四道谕旨，命吉林兵 1 000 名迅速进关，黑龙江兵移驻锦州策援，同时催令陕军兼程赴直。

第三次备战活动 道光二十二年初，扬威将军奕经于宁波、镇江反攻失败，英军扬言北进大沽，清廷惊恐万状，加强在直隶沿海布防，是为清政府在直隶的第三次大规模备战活动。五月十一日，开往江苏途中的山西兵 1 000 名奉命折回天津。十四日，上谕吉林将军经额布、黑龙江将军棍楚克楞各备精兵 1 000 名待命。十九日，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办理防务。同日，调驻锦州黑龙江军进关，察哈尔、蒙古骑兵 2 000 名援津。旋讷尔经额奉旨再调提标兵 800 名到大沽海口。此外，僧格林沁自备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三盟蒙古精兵 3 000 名，于接近塞口的地方游牧驻扎，待命援直。二十三日，又调新备吉林兵、

黑龙江兵各 500 名入关。这样，直隶海防总兵力达 2.4 万余名。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直隶境内虽然没有发生战争，但大规模的备战活动，不能不使直隶人民感受到战争的威胁。经过几次连续不断的备战，天津镇的编制急剧扩大，多达 6 500 人。十月十九日，以天津镇防区绵长，不易统辖，直隶总督奏请添设总兵官员官，清廷著兵部议奏。十一月十六日，命裁撤新疆伊犁镇总兵，移置天津。十二月十五日，讷尔经额奏请以新疆总兵驻扎芦台，划分通州、宁河、遵化、永平等地设通永镇，辖 15 营，统兵 5 486 人。经过调整，天津镇的防区主要为天津地区及南路地域，辖 16 营，统兵 7 504 人。同年，清政府批准在大沽设海防同知一职，专事维持海口秩序。

这次战争，清廷耗费了巨额战费，直隶一省，从道光二十年七月至二十一年一月，仅因“海口防堵”所需各费即用去银“三十六万九千余两”<sup>①</sup>。道光二十一年清政府准予直隶报销海防经费银 89.5 万余两。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在战争期间，直隶的几次大规模备战，把近百年来废弛的海防线重新建立起来，这对以后各次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兵力部署上，清军主要是加强沿海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的防守，兵力又过于分散，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这些弱点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便很明显地暴露出来。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25。

## 第二节 太平天国北伐军入直隶作战

### 一、北伐军驰骋直隶东南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为了支付大量战费和战争赔款，加紧了对人民的压榨和掠夺，使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本来就已经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19世纪中叶，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爆发了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主体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咸丰二年（1853年）十二月三日，直隶、山东、山西等北方省份已发现有太平军的揭帖。同年二月十日，太平军攻陷南京，二十日改南京为天京。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即着手组织力量北伐、西征。为防太平军北上，三月三日，清廷调密云县防兵1000名来京备用，九日又调盛京兵8000名到京，察哈尔兵4000名赴张家口备用。四月一日，太平天国以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春官副丞相吉文元率两万多名太平军从江苏扬州出发，开始北伐，其目的在于扫穴犁庭，直取北京。

咸丰三年五月十四日，清廷调山西兵3000名赴直隶。十六日，直隶总督令总兵董占元统兵于大名府分路堵截太平军，饬藩司张集馨、已革副都统德顺带兵会同防御。十九日，又调盛京、吉林兵各2000名赴天津，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三盟各兵1000名赴热河围场听调。

咸丰三年五月，北伐军渡过黄河进入河南怀庆（治今沁阳），出现了起义军取道直隶，进迫京师的严重局面。六月八日，清廷授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督办河南、河北军务，率军出直隶与太平军作战，理藩院尚书恩华、江宁将军托明阿帮办军务。七月二十八日，怀庆解围，林凤祥、李